

從善到凡



目 錄

序 言

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達爾文主義..... 1

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的作用.....67

人類進化的過程.....89

序

1. 本書分爲兩部分：前半是本書編者哥列夫（B. I. Goreff）的論文，對於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相互關係，分別之點，說得極端透澈，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種山來問題的學者一個便捷的門徑。

2. 後半（從緒論起——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底作用）是恩氏本人的論文，闡明人類社會進化的程序，言短意長，很可玩味，要爲研究唯物哲學的人一部必須的參攷書。

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達爾文主義

恩格思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達爾文主義之實質——自然工藝學——人是一個社會的動物——兩種發展的形式——人類與動物的基本分別何在？——勞動在人類改變中的作用——由達爾文主義過渡到馬克思主義——勞動乃生物發展的一個因素。

恩格思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

我們遠代類猿的祖先如何變化為人的一個問題，對於我們的人生觀，（達爾文曾略說了一個大概）是有很大的意義和特殊旨趣的。但是從所有的研究家中，只有馬克思的偉大的夥伴和戰友

恩格思得以追本溯源，深於其他一切的學者，看透了這個問題，並解決了牠。這位偉大的社會學者和思想家在他的一個普通著作中（可惜未完，只是斷片的東西）曾據具體的和極重要的例子告訴我們：在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間存着怎樣親切的關係。

恩格思並不是一個研究自然的專家和專攻博物的學者。但他却很有興趣和注意研究一般的自然問題，特別是生物學的問題。因此他對於達爾文主義的關係，就不會爲愛好家的關係，故其論達爾文主義所持的觀點對於我們也就有很大的意義了。恩格思是達爾文的一個熱心和確信的擁護者，但他却未將達爾文所有的思想看爲教義和滯固不變的東西。關於人由類猿的生物進化而來及他怎樣變爲人的各個問題，恩格思（一般的馬克思主義亦然）皆能有其獨到之見，新立了一極重要的原則，替達爾文主義開了一綫異彩，給了許多新東西，爲達爾文本身所未曾充分注意及未

完全正確估計到的。

從恩格思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是補充了達爾文主義，並且無疑的只有馬克思主義的達爾文主義者，才能正確地解釋類猿的生物變爲高等文明的人類的問題。假若在博物學者中，關於人類起源的問題還存有不同的意見，那末無疑的，這些大多數的衝突意見，是由於這些學者是非站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上的達爾文主義者，因此他們未能估量到勞動在人類發展中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達爾文的第一種著作“物種原始”是出版於一八五九年，在科學的宇宙觀的歷史上創了一個新時代。同年初馬克思的有名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評”也出現了，在該書中形成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的模型。固然按年代上說馬克思與恩格思發表他們的學說，是較達爾文公佈他的理論原則要早，但彼此道同意合之處，似已深深地指出了這兩大學說有其密切的關係，且在我們所有的宇宙觀上，作了極大的革新。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般的共同點，主要是在使所有現象之總合，生物界的以及人類的社會生活，被那些神學者及形而上學者認為有其特殊的命運的，自神學及形而上學中提出為這一切現象中提出為這一切現象尋得“物質條件的解釋，而此種物質條件可以用自然科學的定則來判斷的”。聖經對於生物尋得“物質條件的解釋，而此種物質條件可以用自然科學的定則來判斷創造的說法”現代科學“見神見鬼”亦多隨聲附和。達爾文概加以懷疑。在他們發生的物質條件中，找到了對於這些生物起源的正確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思也是這樣：起初他們懷疑唯心哲學對於法權的解釋及用舊的眼光去了解歷史，因此乃進而澈根究底，得出了日後為其工作的引導線的一個結論來：就是“一切法權的關係，與一定的國家形式，是不能從他們本身和所謂人類精神一般發展來瞭解的，其結根乃在於生活的物質條件，只在政治經濟中才分解得出社會現象的真面目來。”

(見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評”的序言)

這兩種學說共同之點，乃是都在科學研究的物質的現象中去求出發點，其意旨之表現於馬克思者爲：“辯證法的唯物論”及“唯物史觀”（或稱“唯物的歷史解釋”）。馬克思和達爾文在自然科學中看到了他們的革命學說之一致的堅固基礎；并引起了全部人類生活和知識的根本動搖（見“科學與德謨克拉西”一書中祁米亞熱夫（Gemerijef）著“達爾文與馬克思”）。

當達爾文的偉大著作出世的一年前，恩格思就已將達爾文主義原理，很扼要的指出來了，這是最可稱道的一件事。正是恩格思對前世紀上半期自然科學的進步，詳細研究，及於細胞之發現，和一切力體之共同律加以特別注意的結果，就得了一個結論：“一種現象常常可轉到他一個現象”“一切自然都出於一元，結爲整體，并且不斷的發展”。而達爾文主義的基本意旨也正在此啊！

此種思想，恩格思曾於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四

日在其寄馬克思的一封信中，簡括的陳述過。例如敍述他研究生物學的成績，他曾這樣地寫過：目下我研究生理學，連帶並研究比較解剖學。在這些科學中，其足供推論之材料而不久始為人發現者甚夥。是不是宿學赫克爾也預先感覺到有類似的情形，這是我很有興趣要觀察的。不過有一件是沒有疑惑的，假若赫氏也要去寫一部自然哲學，那末事實便會四面飛舞，不離赫氏左右。主要的在生理學中所以發生革命，比較生理學的研究所以可能，都是由於細胞的發現……一切生物都是由細胞構成的。細胞本身就是辯證法的實體。細胞在其發展中正要經過辯證法的過程，直至未從其中形成一種終結的機體止。只要研究研究比較生理學，對於“人為萬物之靈”的高狂的唯心哲學，便會根本懷疑起來。人類和其餘哺乳類的構造，有完全相同之點，稍一留心，就可覺到。其餘各部，在一切脊椎動物中都有其相同之點，甚至於這種相同之點，還可以很少的在有翅昆蟲，

士中小蟲及其他蠕類身上看見哩。（見亞多拉茨基編“馬克思與恩格思的書信集”）。

因驚詫於赫克爾底武斷的直觀法，雖無達爾文之砍棘開路，恩格思亦獨能根據生物學的研究而發表關於自然進化和自然出於一元的思想。雖然他隱諱了這事實“是真才子才能謙和”，且在其最後的一切著作中沒有提及，然此終證明這位哲學家和社會學者論達爾文主義所發揮的思想，及“智慧人類”之形成與進化的問題所持的態度，是有很大的科學的意義的。

達爾文主義之實質

達爾文主義教訓我們什麼？

在達爾文以前，一般人都相信生物界是滯固不化，不與時俱變的；動植物的每種形態以及人類都是一躍而就，一下子就是這樣完完整整出來，并且是共天地而悠久，永保存着他本來面目。

的。換言之，就是用形而上學的眼光來觀察世界，以為一切物質和生物都是些不變的，凝固的東西，並且研究起來，這一個東西與那一個東西都是彼此沒有連繫的。因此恩格思說道：“達爾文給了形而上學的自然界觀察一有力的打擊，他證明現代全部的生物界（動植物類），都不過是千百萬年長期進化過程的產物”。（見恩格思著：“由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恩格思用以下簡略而明確的語句，解釋達爾文學說的基本義旨：

“達爾文由他的科學的遊歷中，供獻出一種意見來：認為一切動植物的形態都不是常態的而是變化的。為在其室中更宏此旨，除了用人工的方法來培養動植物外，再沒有可以供觀察的東西了。英國也正在這方面算是一個模範國家，自非偶然，其他國家如德國則培養工作成績就較英國差多了；近百年來，成效尤大，不費吹火之力，便可引證許多事實。據達爾文的觀察，此種人工

培養方法，可使同一形態生物能發生一般人認定不同形態生物間之差別的更大差別。這一方面證明了生物的形態是常變的，另一方面又證明了具有各種形態的象徵的機體有同出於一祖的可能。後來達爾文曾研究到自然的本身，能不能找出這樣的原因，可以使生物的機體獨立地發生改變，好像由人工增殖的方法所達到的一樣。本此目的，他就去研究胚胎多而成熟者少，其中間之所以不相適合的原因。因為每個胎芽都必圖發展，就免不了生存競爭，或直接交戈，決勝負於齒牙；更或爭取地盤，都要在光明處奪得一席地位；此種現象於植物界亦可見之。達氏深信在這種爭鬥中，凡那些能有最多機會成熟與繁殖的，一定是具有特殊利器足以操生存競爭之勝利的個體。這些個別的特性，據他的意見，都有遞相遺傳的傾向，假若牠們轉進到同一種類之少數個體上，那末由於反復遺傳的緣故，也就能加增他的次數強度。最後他得了個結論：一種個體若不具

有這種本能，就要較其他能格外適應環境的個體易於在生存競爭中遭受滅亡，因此由於自然淘汰而生出形態的改變，優勝劣敗，適者得生。（見恩格思著“反對杜林”Anti-Dühring）

所有自然界內有機體的奇異適應及其進化，按照達爾文的意思，是至簡易解的。生物是很昌繁的，他們往往生殖後裔，多於他能生存的數量，因此在他們中間就要爲着食物，地盤和溫度等等，開始生存競爭。在這競爭中間，保存着的只有那些善於適應周圍環境的生物，此種自然淘汰是盲目的，無組織性的。淘汰的物質，由於機體的變化，是常存在的。同父母所生的小孩也不能彼此完全相似，各有各的特性，此種特性，於生存競爭有時是有極大助益之處。這些特性因爲遺傳關係，便一天天地鞏固起來。累代相積，終至造成新的特性而必然引起形態的變化。

由是達爾文不僅指出了生物的自然界是改變的，並且找到了此種改變的法則。根據繁殖，改

變和遺傳，他給了一個純粹機械式的生物界進化的唯物論的解釋，謂此種進化的動力，便是適應環境。這就是說動植物界有能適應其生存條件及周圍環境者；不能適應的，都便因此滅亡，生命不保。在這種極簡單而明瞭的意思裏，正確地說來，正是包含着達爾文主義的基礎。

自然工藝學

達爾文主義告訴我們：一切動物或植物只有他們能適應自然和其周圍環境，才能存在。就是說到生理器官的適應，也就是說生物為應環境和自然條件的要求，必須改變他的全部身體組織，改變他的器官，以至改變他的身體的一部分。某種生物的一切生活，習慣及其生活的性質都依其器官的改變和身體的構造而定。因此欲解決生物的自然界的進化問題，首先就須說明何謂器官及他們對於動植物有什麼作用。

馬克思也正是這樣來觀察達爾文主義的。馬氏以其天才過人，為絕代的思想家，只一句話就將此學說精髓，說得透澈盡致。他說過：“達爾文曾致其興味於研究自然工藝學的歷史，就是說致力於研究動植物器官的構造，此種器官在動植物的生活上具有生產工具的作用”（見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

因此每個器官都可看為動植物的自然的天賦的生產工具，他們可以履行一定的工作和職能。進而可知一切器官只有在生活環境改變，生理上已經引起新的自然生產工具之必需的時候，才能發生。在此時就要依着達爾文所舉的進化因素（如改變，淘汰，和遺傳等）而發生新的器官形態和新的種類。反之，由於改變環境的結果，當使某種器官變為廢物，就是當他停止履行他的一定職能時，他就要萎縮而退化了（人類這樣器官，如盲腸等是）。

由是依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可知達爾文主義的

中心：就在他研究怎樣和如何改變自然的生產工具——器官。換言之，自然工藝學的歷史就是生物界發展的歷史，生物自然界進化的實質，正在於天賦工具的改變。近百年以前俄國的學者曾稱器官及有機體，為工具的合體。

假若是如此，那末人為工藝學能教訓我們什麼呢？是不是能作這樣的結論：生產工具的改變可以決定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句話：於社會人類的生產器官構成史，每種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歷史也是否值得與以同樣注意呢？

馬克思這樣設問，是在促我們注意到科學研究之新的部分。

可是馬克思不但這樣設問，還很淵博地去研究他，而獲得了回答。此種回答，在人類社會科學及社會學裏，與達爾文的發現在研究生物自然科學的部門裏，即生物學的部門裏，實有同樣的意義。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內部推動機。言不妄發的恩格思，在馬克思墓誌銘中，曾

將其友人的生時偉業與偉大的博物學家的生時宏功相比較。他說道：“與達爾文發現了有機的自然界發展的定律一樣，而馬克思乃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法則”恩格思並將此種意思指出過好幾次。

我們可以看一看馬克思主義怎樣的進行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了。

人是一個社會的動物

達爾文告訴我們：人類不能自誇其出身之高貴，人類是非依神力指示在製造天地第六天而出世的。人類只是從野獸界內脫身出來之最發展而最完美的東西；他只是生物自然界的一部分，也要服從自然定律的。但是為什麼獨將此種生物形態抬得這樣高呢？什麼原因將我們的類猿祖先變為現代文明的人呢？

馬克思和恩格思的一部份的學說所謂唯物史

觀，正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這部分學說的一小部分，也就是恩格思在這個小冊子裏所要究研的。

大家都知道，許多動物，尤其是食草類及幾種昆蟲，都是營集體和社會生活的：如家庭，羣體，集團和部落等等。生存競爭（就是說要獲得食品，防禦敵人及繼續傳種等），不能不激動他們走向這條路。因此就不能說：社會是許多單個有生個體間任意妥協的結果：以為他們藉助其理性，得了結論，覺得羣居生活利便一點，而遂聯合，集聚來營社會生活。事實却與此相反。一切社會的存在不是決定於組織社會的個人的自由意志，而是決定於這些個人中一般的物質生活條件；此種條件能統一個人而使他們好如一個整體。一句話：就是社會為生存競爭的工具及適應自然和周圍環境的武器。

各種生存競爭的條件，需要各種各樣的適應，自然也就需要各種的組織形式及各種生物社會的生活制度。在蜜蜂，螞蟻，猴子，海狸及

其他動物中，我們看見他們有經常的羣居社會生活：如經常的互助及經常的分工。這可說是動物社會內最發展的形式。

至於說到人，他是不能孤獨存在的，單身是從來沒有過。因為他不是一般的動物，而是“社會的動物”，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已正確指示我們了。他不但生活於自然中，而且生活於社會裏。本來人就是從那些累代成羣而居的類猿生物發源出來的。在社會外不與類己者合作，則孤單的人就會軟弱無力，其生也慘，不能自得食物，防禦猛獸而保其生命。只有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最好的爭鬥工具，營共同的社會生活，人類乃臻今日之盛。

職是之故，人類還是離不開生物發展的階段：是屬於常營共居生活的動物。

但是又發生了問題：人類社會為何能達到這樣高的發展而與動物界分開？為什麼其他社會動物沒有可能照“文明的”人類同樣的路徑而發展？

欲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須回答其他一個問題：就是人類的生存競爭的方法是不是完全與其他動物一樣，或者還有其他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能不能將達爾文主義對於有生自然界發展的定律，機械地簡單而直接地轉用於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呢？

通常對於這個問題，好像有一種直接了當而肯定的答復。此是初淺之見，被馬克思所指摘為膚淺之流，於人類發展問題妄行推斷。（見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七日馬克思寄庫蓋里曼的信）有一般學者們，想將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學說搬到社會科學的部門中去，而不分析此種競爭在各種社會形式發展的歷史中怎樣表現，採取如何的形式，結果致達爾文“生存競爭”的一語並不能解說某項具體的競爭，倒成了一句空話。因此就不能簡而又簡地將達爾文的定律移用到社會上。任務是在說明自然科學的一般定律在人類社會裏。誰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就不能在人類社會歷史中

找出任何合理的法則來。

恩格思說：“環繞着我們的不僅是一個自然，還有人類社會，亦如自然界一樣，也有其發展的歷史與科學（見恩格思著“論費爾巴赫”“Ludwig Feuerbach”）。這就是說：人類雖然起源於動物，但是人類的發展在所有文化史的過程中，是大有區別於動物界的進化，也就是說：人類發展的形式與獸類發展的形式是不同的。因此達爾文與馬克思在其研究中，其出發點自然是不能一樣。謝姆考夫斯基(Semykovsky)說得很對：

“生物學者的達爾文是在同獸類的密切關係上去認識人類，而社會學者的馬克思則更進一步，是在同獸類的根本分別上去認識人類的。”（見謝姆考夫斯基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人類的發展的形式與動物不同之點究在何處呢？

我們可以簡括地研究這個問題。

兩種發展的形式

我們已經知道，一切動物只有適應自然方能生存。人類也是動物，自然要受此定律的支配，不能例外。然而，人之適應的過程與其他動物大不相同，因此，其發展之形式亦大相懸殊。

假如任何一動物落到與他從前所居的地方不同的新處所時，則其爲要適應新的生活條件，總以“一身當先”用各種抵抗的方法，來應付自然界的不合宜的現象。若動物由熱帶落到寒帶時，則其遍體漸爲稠密之毛所庇護。由飼養於動物園中之熱帶動物爲例，就可坦然明瞭。反之若動物由寒帶轉入熱帶則其滿身所被之毛日趨減少。但人類却無改變自己身體以適應新的生活條件的可能。雖然人類較之其他動物亦有適應各種生活條件之本能，但其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統治地球，絕不是由於他的身體，而另是一種“工具”：代其所

缺乏之天然工具，人類乃發明了人造工具。

例如：人類之禦寒非如熊之叢生其皮毛，乃剝死動物之皮以護其體；為要游泳，人類不能由自然界得來如鵝兩趾間所生之蹼，而造舟削槳以代之。由此看見，任何動物的適應自然，是它屈服于自然，人類則達到相反結果，實使自然屈服於己。這即是說：人類不因其自然環境，改變其天生的器官，而是創造和完成此種或別種的人造器官，此種或別種的工具，如引長或完成其天生器官者然。拿橈來說吧，就是手的延長，也就是人造的器官。

因此，動物在其為生活而鬥爭中，是機體的去適應外圍的自然界。人類之目的雖同，他却在自然與人類之間，創造了可以保護人類脫離自然環境的直接壓迫（或者多少可以將牠減弱）的人為環境。此種新環境日趨複雜。沒有這新的環境，我們一步也不能前進。此種新環境似乎轉成了人類的第二自然。假使人為的環境因某種突變突然

消滅，則人類就會一變而回到原始的半野獸的狀態。

即是說：人類之適應自然，其過程非被動的，非生物狀態的，非如其他動物之自然無知；而是自動的，技術的，智慧的。即是：人類為了滿足自己各種的需要，影響自然，自動的去適應它，改變它，變改物體的形態。換言之：動物屈服於自然，人類則使自然屈服而適應於己。在工具幫助之下，為生存而競爭，改造自然，統治自然。文化的任務是使自然適應人類的需要，使人為的環境日益複雜與發展，加強對自然的統治，使自然屈服於自己的目的之下。

因此恩格思這樣說：“動物只是利用外圍的自然界，而引起其變動者，只限於其本身所至之地；人類則製造它變改它使它供給自己的目的，使它屈服於人類。這正是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分別。”
(恩格思著：“勞動在猿轉變到人的過程中的作用，”)

因此，已脫離了動物的階段的人類，其爲生存而競爭的形式是不同的，與動物之象徵各異，結果遂殊。因此，欲明瞭：爲什麼人獨高高在上，爲什麼人類由自然界的薄命奴隸，變成了自然界的統治者，應該很注意的，不是去認識人與動物之聯繫其相結之點，而應該認清他們彼此間之絕對不同的地方。因此，應就近研究研究什麼是人類用以征服自然的人爲的環境？總之，所存在的，不是不可思議各種盡有的發展形式，而只有兩種形式：一個是達爾文孜孜研究的機體發展的形式，一個是大相懸殊的技術發展的形式，其發展的定律和性質是由馬克思最初發明出來了。

[註]

[註]：本來達爾文（Darwin）基於武阿烈時（Verres）的觀點（它尚在達爾文前便胚成了物種起源由於天然淘汰的思想，如像恩格思之無馬克思獨立地形成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一樣。）認清了動物發展

與人類發展之區別。例如，在“物種起源”書內，他寫道：“人類具有偉大的能力來適應新的生活條件。發明武器，器具，及獲得食物，保護自己的工具。反之，低等動物處於生活條件改變很大時，則必改變自身的構造才得生存。”因此，不僅是身體而且人類的精神也是自然淘汰的對象。但是，說到自動的適應現象，達爾文只注意到生理的，即是，對於機體發展的影響，因此他不明瞭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此種影響的作用。只有馬克思才注意到社會形式的進化，以社會的眼光，注意到自動適應的現象，研究此種表現在社會進化結構中的作用。結果，給了我們明瞭此種進化過程的鎖鑰。

不錯，由上所說，也可以提出反駁來：許多

動物也能改變自然而結果也創造了人爲的環境：鳥之造巢，田鼠之掘穴開道于地中等。同樣，要是再想到蜘蛛之結網，海狸精巧的建築，蜜蜂建築術的高度發展，我們可以看見動物的建築物有時是很複雜的，然而此等動物用何方法影響於自然而自身造出驚人的製造物呢？此等動物創造一切，只是依賴於天然的“生產工具”，天賦的器具——身體，即是只在天然創造的機體的幫助之下，才有可能。因此結果只能專司其一，蜘蛛不能有如海狸之建築，海狸不能織網等等。然而人類之影響於自然，非賴自身天然機體之幫助，乃依賴於自身造就之人造器具——勞動工具，生產工具等。由此人類可以爲紡織者，可以爲建築師，只要將人造的器具變換一下就得了；使此工具之形式，性質，使用，都日益改善，五花八門，實察其益處，改正它，完善它，使用少量的勞動力，得着多量的結果。人類愈文明，則其所使用的勞動工具愈多，而所費天然機體之力則

少。

人類製造工具，究竟要達到些什麼目的呢？他用了這些工具，就好如增長，加強，完善，修飾和一般地積極發揚他的身體器官——如手足等——一樣。他為着各種一定的目標而應用此等工具，並使其各習於一種專門工作。這才給了人們耗費少而生產佳的可能。器械和工具可以看為人類器官的外形。物理學家維聶爾（Wiener）說得很對：“望遠鏡只是一個加增視力的眼睛，而電話只是一個加增聽覺的耳朵”（見維聶爾著“感覺領域的擴大”）。鋸子是按照人類的牙齒樣式造成的；鍬和鋤是仿照掌和爪製成的；槌子則模仿縮緊的拳頭；橈槌是仿照掌的垂直姿式，小白窩是模仿足的跳動製成的，諸如此類，皆是這樣。因此人類創造與其器官相仿的技術工具，來完善，改良和加增他的天賦自然器官，其能力因之大事加強了。

所以，我們既斷定，人類的文化進展，並不

是人類生理發展的繼續。設使我們看見高等文明人類和最落後的野蠻人，在其體質的生理和解剖的關係上區別很少，那末我們可以用極簡單的理由來解釋：即當人類已由低等階段發展起來，其身體構造達到現在形式以後；身體的改變幾完全停止了。蓋自那時起，人類就已開始改變和完善他的勞動和爭鬥的技術工具，視此種技術改變之程度，個人或人羣之強弱繁焉。

動物僅能依其肢體，天賦工具，（我們曾記得一句成語：“狼是狼足養活的。”）獲得食品，積以養身，這是很明顯的。此種天賦器官是不能任意來更新，變化和改造的。只能由長期的練習，數千年的各種原因，才會改變的。故說來動物只是消極和盲目地來適應周圍環境的改變，而反映到器官的構造。至於說到人類，他因利用技術工具，得以經常地增加其由自然界所獲得的需用品的積蓄。因此他是積極地適應其周圍的自然環境，藉助於他自己所完善的技術工具而得改變

他的生存條件。

因此人類的工具和動物的器官是有同樣的作用的。達爾文的學說，把生物界消極適應自然的定律告訴了我們，馬克思的學說，就將技術的積極適應的法則，一發無遺。所以不能將生物界發展的定律簡單而直接地轉用到人類社會上：因人類的生存競爭的方法，完全與其他一切動物不同，他不是隨和自然條件，而是降服自然條件。動物始終只是自然的奴隸，而人類則盡力改變自然為他的經濟，並漸漸地成為自然的主人翁。

人類和動物的基本區別何在？

但是何為使人由自然的奴隸變為其主宰的原因呢？人類和動物的基本差別在什麼地方呢？換言之，即人類由什麼得到這種才能，得以聰明和積極地影響自然，並因此而創造文化？

對於此種問題，在古時人類思想就已叩問過

了。許多民族的宗教於其神話和幻想的傳說中都描寫道：人類文化的發生是上帝對人類生活所賜給的恩澤，如古代猶太（Juda）信仰聖經中的神話，承認亞當（Adam）夏娃（Eve）是依神蛇的降旨而吮嘗“智樹”，因此得成聰明人物，在其面額流汗和手的勞動中獲得其一切必需物品。又如依古代希臘人的傳說，謂半神蒲洛蔑切儀（Prometheus）因憐人類過的是極悲苦的生活，遂由天宮採取火來，轉給人類並教人類製造工具，由是遂為文化之萌芽。

至於說到一般學者當馬克思的學說未出現以前，對於文化發生的解釋，實質上與宗教說法相去不遠。他們解釋（即現代向我們解釋的那般唯心論者，他們目下還在向我們解釋）知識的泉源就是人類的智慧，視智慧為神聖之物，是一種超自然的東西。他們相信文化是由概念，思想和智慧所引起的：如聰明的猴子能改石頭為工具，天才的原始人類能發明取火的方法等等。總而言

之：人是一個文明的生物，人之所以發展，是由於他有天生的智慧，神聖的聰明天稟。他們的理論方式：就是“初有思想”。

邇來我們知道並非如此：不只是人，才能思想。科學確定：思想是與腦有連帶關係的，因此，有腦的動物，在或種範圍內也能思想的。沒有什麼奇怪！我們若憶及一切動物是在生活競爭中鍛鍊和發展他的全部器官和能力的，那末在此種爭鬥中極重要而極可靠的工具之一，就是各種各樣的思想，智慧，精神程度，及心理行為。很明顯的，猴子，貓，狐和虎等的狡猾並非別的，也不過是生存競爭中的一種工具，與他們的腳掌之敏捷而銳利，齒爪之強固同一作用。故知識若是生存競爭的工具由於天然淘汰而日益完善起來，那末很明白的，知識的起源也是與人類和動物的一切其他器官之發生一樣，必須受自然和一切原因之左右。所以人類之始終具有一種思想的能力與其他最發展的動物是相似的。

實際上，有許多事實容我們作這樣的結論：當人類生活開端的時候，微小而遊蕩的原始人類團體，於外圍環境，已略有知識。如區別所搜集的食用植物和小動物的特性，隱避洞中以禦猛獸，大雨及夜寒，即其證明。關於自然界的許多知識，人在獸類狀態中就已承繼了，好如動物繼承建造巢穴等的能力一樣。

但是，為什麼動物的智慧尚停滯于萌芽狀況而人類的心思獨高掌遠蹠，一往向前呢？蓋因人類和禽獸的差別，不在數量而在質量；換言之，就是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不是發展的程度不齊，而是發展的性質有異。異點何在呢？在乎人類能製造工具，而動物則沒有這種可能。從最原始時打成的石器起，一切藝術和製造工具的智識便使人類脫離了禽獸的隊伍；只有工具的製造才使人類超出於天賦器官的限度以外。例如以前人類不能捕鳥，而鳥之於人漠不相關；自從工具逐漸發明，人類始用彈弓捕鳥，而鳥之於人，遂有

相當意義。人類的生活資料因此推廣了。

原始人類不能自製食料，要獲取食料，祇有藉採集或劫掠的方法，一切食品都由自然供給。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須與各種仇敵作不斷的鬥爭；要是他不做個生產者，必然要做個戰鬥員。但是人類學會了製造工具，技術隨之產生。技術上的第一種成績便是使人類容易抵抗野獸的侵襲和容易獲取食料。原始的工具和武器本同屬一體，人類握有工具，便可以出自深林，遷於平原，不怕糧食的恐慌，也不虞猛獸的危害。技術發明，生活資料的水平線由此增高；出到平原以後，發現人工取火的方法，生存資料的水平線繼長增高，更與前不同了。

因此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在乎人類由於製造工具和武器的結果，能自由擴張生活資料的範圍。“和人類共同出現於自然舞台上的更有人類的技術”。植物攝取食料於土壤內，果子成熟也就落在土壤上，此外再也不能動彈；動物則可以

自由行動，除少數下等動物外，大概都能自動的尋找食料，選擇環境。即此便是動物比植物佔優勝的地方。但是動物不能增加食料的數量，以供全種族的消耗，而人類獨能辦到。因此禽獸較優於草木，而人類更優於禽獸。

我們難遇見任何種工具也不知道的，且不能為自己製造任何種器品的人。這就是人類和禽獸間最深的界限。

誠然不錯，有些高等動物當牠們攫取食料或與敵人爭鬥的時候，也能利用工具：譬如猴子經人教訓，常利用調匙，盤盞，衣服之類以完成其被人指定的某種目的。牠還知道晚上拿樹葉當被褥；用樹葉在樹枝間建立頂蓬；向敵人拋石塊，柴條；取石擊碎堅果。……至於象呢，牠常用長鼻攀折樹枝，掃驅身上的蚊虻，然而牠們僅能利用取之於自然界的現成的工具，而不能自己改變和創作工具，不能藉助於工具而完善其器官——四肢，齒牙，蹄角之類。故工具的作用在動物的

生活中，實不及野蠻人生活中之萬一。

動物界知道製造勞動工具者只有人類，人類實不愧稱爲“造物主”。富蘭克林（Franklin）曾下人類的定義道：“人類爲製造勞動工具的動物”，〔註〕馬克思認爲最精當的定義。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所以不同者正由於此。

〔註〕：弗伊列（Veile）爲研究古代文化的鉅子，著有原始民族的文化一書，嘗謂人類異於其他動物者，其特點有三：

（一）語言，（二）工具，（三）火的應用。

同時他又正確的指出高等動物已有語言的萌芽，并能使用工具，因而認爲只有火的使用才是人類所獨有，語氣之下，似乎只有火的使用才是人類異於其他動物的特徵。然而當這位學者解釋取火和舉火的首要方法時，他不得不借重於勞動工具的作用，而斷定祇有利賴勞動工具，火的應用才能經久。因此更顯而易

見，勞動工具的生產實為人類進步的獨一無二的原因，也就是人類和其他動物間的根本區別。馬克思和恩格思在其早年著作（可惜在最近才出版）德國的唯心哲學一書中說道：“人類依學理而論，其別於動物者或依智識，或依宗教，無所不可。在實際上，人類開始別於其他動物只在他開始製造養生的工具的時候——這一步是因身體構造的變化而斷定的。人類創造了養生的工具，使間接的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這段話切不可等閒視之。

正是從能製造極簡單和極質樸的人為工具的智能發生時候起，人類之發展，就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其動物形態之發展的過程，於以告終，而人類歷史，乃開端發軛。從此，人類之所進化，所完善而與日發展者，非其機體之器官，非

爲齒爪，如動物然；而正爲其自己所製造所發明之勞動工具及爲生存而奮鬥的武器。工具乃宛然成了人類雙手之人爲的屬物，爲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中間人。人類即用此工具以適應自然界，在其幫助之下，乃創造了爲其一切生活所匯流的社會環境，其爲生存而鬥爭底性質，又受此環境影響而大大於以改變。在勞動工具幫助之下，對於自然界爲一種自動的技術的統治，取奴隸式的被動的服從自然界之地位而代之：其已行消却之“毛髮衣冠”（註）而代以華麗麗服，變居巢爲住室。此例之昭昭者。總之，其俯首服從，聽天由命之態“你當如此”漸爲自我所主“我想如此”所代。

〔註一〕：此地所謂“毛髮衣冠”並非指人類採野獸之皮毛以爲衣之意。蓋用野獸皮毛以當衣，雖然當時格式非常粗率，但總叫衣服，用不著加上“毛髮”二字來形容。此地所謂“毛髮衣冠”是在沒有發明

衣服以前，是原始人類對於自然界一種生理的適應，橫身蔽毛，以避寒却涼。只有在人類發展到某一階段上，才發明衣服以禦寒，漸代替了“毛髮衣冠”的作用，因此毛髮乃日益消沒。今人與古人較，那古人簡直就是“毛人”。這種殘餘，至今仍保存着（如多毛，盲腸……）即生物學上所謂“多餘器官”已完全失其作用，然在某一個時期，却為人類所需要過的。——譯者。

蒲列哈諾夫（Plekhanoff）說：“人類在勞動工具之中，得到了改變其體格構造的許多新器官。至使用這些器官的時候起，其發展的歷史，完全換了一番新局面：前此之發展如其他動物一樣，僅為自然器官的改變，今則已勢變事異，其歷史之發展，主要乃在於人為器官之改善，生產力的發展”。見伊所著之“歷史之一元論的發

展”。

動物的器官，為其身體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人類的工具是與人類本身分離而存在的。惟其因此，乃使人類有推行分工的可能。分工之發展，愈進步，愈專門化，則社會用以獲得生活工具，繼續其生存而因此使社會對於自然界之統治權增加的人為器官，其數量也就愈多。即此，使單個的個人，不能領有維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器官，萬具皆備，有如動物然。因此，人類社會戰勝自然界之程度愈高，則每個個人若離此社會而孤立，其日形無力，也就愈甚。勞動工具的使用，使每個個人對於社會之依賴，日趨密結，而益形鞏固，正此之故。

因此，技術——為人類社會所創造之人為的器官系統——使人類能高超優越於動物界。而工具即為人類之發展，開闢了新的途徑和可能並給人類對於自然界以一種驚人的權威。且看馬克思說道：“勞動工具的遺物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構

成與骨格的殘餘對於研究今已絕跡之某些動物形
式的組織，（即指其身體之構造而言）其意義蓋有
同樣的重要”。——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三部第五
章。

所以不僅人類才能使用工具這樁事，那只是說在所謂人類之天性的特點上，其萌芽之態，
無一不可在其他各種哺乳動物中，可以遇見。因此將人類看為一種什麼特別的東西，“萬物之
靈”，是沒有任何理由的。蒲列哈諾夫說得很
對，“可是不要忘却了！數量之別已轉為質量上
的不同”。以萌芽之態而存在於某種動物者，則
常為特著之標誌以存在於他種形式動物之中。特別
關於說到使用工具時，可以看得見。古象之掉
斷樹枝及用此以扇開蚊虫，這件事是很有興趣而
富有意義的。但這種使用樹枝與蚊虫鬥爭，在古
象發展的歷史上，沒有任何重要作用：古象
並不因其祖先會用樹枝以扇開蚊虫而才成為古象
的。人類則不如是。澳大利野蠻人之生存，純依

賴於鎚鑄，正與近世英國之存在，賴其機器一樣。若去其鎚鑄，使其業農，則澳大利亞野人亦必因其必需而改變自己之生活形式，向有的習慣，以及其思想本性，亦無不改變。勞動工具，對於人類發展的作用，蓋由此也可見一般了。

勞動在人類改變中的作用

起初，類猿的人類祖先，也和現代的猿，象一樣，常以其本能的，盲目的，甚至反應的作用，來利用四周的自然物品，並不加以改變。遇有不幸之變，身入新境的時候，如落居草原，便不得不借助這種本能，否則新境未適而身已先亡。爲得使用工具，便要習於直立，解放前肢。這樣，就使用棒杖，拿石頭，格外容易。得寸進尺，祖先們便更想法來改變，他使其適應於己，製造他以宏其用，如碎之使其小，磨之使其銳，擊之使其鈍，以便攜拿。又加以掘土穿眼，削器

磨物，摩擦搔扒，都不是齒牙手足所能做到，人便要用力試造其器，產品遂多。藉其幫助，得保生命，以禦自然。(其實，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類愈能實現其積極的勞動過程，即使有生和無生的自然界更服從於己，則其本身構造的改變，也就愈顯明。經常地使用勞動和鬥爭的工具，結果才使得我們祖先的“毛巴掌”，成爲今形，就是很鮮明的例子。

(附註)：達爾文寫道：予認爲列包客 (Lec**bbock**) 所說：“當原始人爲着某種目的，應用燧石，便要將他打碎，取其尖鋒，其距任意切斷燧石而加以製造，也已經就不遠了。切石時必拚出火星，磨擦時便會增加熱度，由此便發生了兩種取火法”是妥當的。

馬克思有下列一段話，來闡明這個意思：“勞動首先就是在人類與自然間所完成的一種過

程，在此過程中，人類自行調劑，管理他本身與自然間的物質交換。人亦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的物質相對而峙。為使自然物品，改變形式以合其用，必勞其手足，費頭費腦，藉着這些自然器官的活動，來影響自然，改變自然，同時使自身構造，亦改舊觀了。藏之者，盡發而揮之，使服從於己。……因此，自然所賜的物質就成了人類活動的器官，與本身的器官連接起來，如此，便不像聖經所言延長了天賦器官的限度”。（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因受積極勞動過程的影響，人類不僅改變了自己的機體構造，智慧和理解力也因之發生改變。大家曉得，在人類用勞動工具來左右自然以前，其生活經驗，如動物然，極為單調窮竭，因為對他有意義的物質範圍，實太窄狹了。因之理智閉塞，萬難進步，並不比動物高強些，只從能利用和製造工具時候起，才經驗日富，萬象映眼，百樣翻新，見識就擴大起來。在勞動過程

中，以其積極影響物質而加以改變，人類得常能看到許多結果，新變化，發現新的特質，新的門面，理智也便因此日益發展，完善銳利。當使用天賦工具的時候，便是以本能來代替意識，行其所能，主動者是自然習慣，生而有之，動物界固不如此。一當使用技術工具，要使其活動“在規在矩，有條有理”，因之，致理格物，推演為有意識的結論，也便不可免而成了必需。所以說來，只有從人類製造和改良工具的時候起，才漸漸地養成了判斷的能力。結果，人類對於自然界便形成了一種有意識的（自覺的）關係；其行動乃有組織，有計劃，有利益，而因此在人類與動物之間，掘下了一道鴻溝，不可飛渡。

馬克思說：“蜘蛛結網，擬諸織工；蜜蜂營巢，其技巧不遜於建築師。然而就是以最劣等的建築師與最靈敏的蜜蜂相較，其中便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因為要是人類去做蜂房之前，其形式如何，已先有成竹在胸。工作過程完結以後，得到

一定的預想的結果，在工作者的意象上，早已存在了的。人類並不僅變換自然產物的形態，同時又實現了自己‘有意識的目的’，視其‘有意識的目的’如何，而決定其行動的方法及性質，並且用其目的去制勝‘意志’。制勝‘意志’，並不是單調的活動。姑將工作過程中各部肢體的操作，置之不論，只說勞動時之運思費神，其需要愈多，則工人在工作中為勞動的內容和方法所引起興趣越少。其所享樂於勞動，視為智力與體力之遊戲者，將愈益無幾”。（馬克思所著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馬克思說明了“人類勞動”與“動物勞動”不同之點，於人類之有意識的活動，給了很重要的意義。此種有意識性與有計劃性是偉大的意象力之產物，而偉大的意象力又是使用“人造工具”來影響自然的結果。可以說，思想是人類雙手形成的偉蹟，為勞動的產物。因此就得以下的結論：當剛起首製造初步的簡陋的，原始的，不精巧的

工具時，在原始人們的腦子裏已經發生了意識的曙光了。祇是這個要件，才把“類人猿”改進到“猿人”。

這樣，智慧不能算作人類進化中最根本最初步的“活動的淵源”，是毫無疑義的了。智慧是勞動的結果。智慧之發展，一以人類積極改變自然的過程中所示之方向為依歸。恩格思說：“了解人類社會歷史的管鑰，正在勞動發展史中”。

（摘自恩格思所著“Feurbach”一書中）

並且，語言——“說話的天才”的發生，不是驟然的，是與勞動，製造工具，長期發展而複雜的結果。最初的音節，發現於不知不覺的呼喊之中，這種呼喊的聲音是在勞動過程中用力時奪胸部而出來的。（或者在“為生存奮鬥”用力時而發生的）。這種呼喊——很能辨別出來由何種工作中發生出來的；（“哈”——樵夫的聲音，“哦”拖重者的聲音，“嘿”跳高者的聲音，“呼”吹火者的聲音）。這就是人類語言的雛形。我們一定要注意

到，最初勞動是“集體的”，勞動的呼聲，在“集體的勞動”的組織中含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原始的技術非常幼稚，工具拙笨，勞動勢不得不採用合作的集體的形式。因此，勞動便必然造成原始人類之鐵環，把散漫的“羣”變成堅固的組合，而形成“人類社會”。由合作的集體勞動，使交換意思的方法也要改善起來，隨之種種呼聲，間雜以手勢表情，以致傳達之用。

比方“哦”的喊聲，要是帶有命令或詢問的音度，則為“拉呀！”“拉起來了沒有？”由此可知語言的發生祇在同類的社會裏，勞動合作中，才有可能。(註)——有一篇小說可以為證：“印度的某國王曾命將許多孩子放在與外面隔絕的場合去養育着，不使與社會接觸，把現成的吃用東西拿進去，派啞叭去看守，去把門；後來小孩子長大了，於是打開門讓他們跑出來，他們都是愚蠢異常，不會說話，祇有和禽獸般的要求，用幾種手勢去表示他們的意思”。由此可以知道動物不會

說話，是因為他們沒覺得有“語言”的需要，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這種需要的緣故，又是因為他們不是“集體勞動”，彼此間沒有甚麼事用得着聚談的。著名的語言家奴阿列(Noerie)他經過許多考察之後，證實了語言的發源及其發展，是和工作的發生並進的，這是完全正確的論調。語言最初的字根——不是名詞，不是指物的實體字，而是動詞，最初是描寫動作的虛字。指物字的發生較遲，由某種物件成為人類勞動中的必需品時才發出來（起先按其作用發生各種工具的名詞）。〔參閱——工具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撲落託尼可夫(Plotniekov)校訂〕。

因此我們的語言，隨勞動之複雜和進步，而日益完善，詞類標語更形豐富，直至能用以表達任何思想。其實，思想也是一種語言，不過形式較弱，表現簡略些罷了。無語言一切觀念便無從表現。常見沉思的人，沉思既久不由得——幾乎不自覺地——流露成語言，這是並不足為奇的：“連

思而發於言”就是指此類現象而言。俄國最著名的生理學家謝成諾夫（Sechenoff）說：“思想是分割成三分之二的‘事物反射’”（譯者——這裏的意思是說，由‘事物的反射’而激出語言來，僅是思想尚未發之於聲響，即非完成的語言，此種非完成的語言——思想，故稱為分割成三分之二的“事物反射”，其餘的三分之一的“事物反射”即指語言內的響聲之一個要素也）；麥克斯謬列兒（Max Müller）研究語言的結果，做了一個結論，說：“思想是無聲音的語言”。他就是說：思想和語言二種現象之中，語言是母，而思想是子。

這樣我們在此地能够看出來什麼？我們看出勞動過程是人類社會最主要的過程，“勞動造成人類”（註——見恩格思所著的從猿進化到人過程中勞動的作用文章中）。很明顯的，恩格思發表了“勞動創造了人的本身”的理論，同時，在馬克思的論文中也說過的（這種話我們已經引證過了）。

他說：“人類影響自然界，而加以改變，人類本身的構造也跟着起了變化”。〔見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中〕。要是沒有人造工具，沒有積極的勞動過程，則人也不過是尋常一種動物而已，永為自然界的奴隸，同猿猴，大象，水獺之屬，無何所別！當一切生活條件一以本身機體是賴時，則尚無人類歷史可言。待勞動工具替代了人類本身的機體，勞動工具因而在人類生活中佔重大的作用時，才發生了人類的歷史。從這時起，達爾文的學說就終止了，而馬克思學說開始了：“生物學”的地位讓給“社會學”了，機體的進化，轉為技術的進化。換言之，從這時起“消極的適應”自然環境來影響人身機體終止了，而“積極的適應”——人類來影響自然——開始了；且因“機體”在環境中所為的“改變的結果”，“機體”的本身也隨着改變了。

辣伯利握拉 (Labriola) [註——辣伯利握拉是一個唯物史觀的學者] 說：“歷史是人類一手完

成的事業，因為他能發明和改良工具，借助此工具，就製成了‘人爲的自然’而轉影響到人的本身，又以其目下所得成績，日新月異，改變無窮，‘人爲自然’便成了人類發展的原因和條件。因此把人類的事業——就是歷史——歸結到簡單的‘生存競爭’，這是毫無根據的。假如‘生存競爭’也改變和完善動物的機體，發達了新的器官，但這種‘生存競爭’決不會產生經常的，完善的，久遠的活動——人類前進的活動——的。我們的學說不應與達爾文的學說混爲一談”。

伯伯爾 (Bebel) 之說，更爲鋒利，“人與動物差異之點，就是人可以稱作有思想的動物，而動物則是無思想的人”。〔見伯伯爾所著婦女與共產主義書中〕。馬克思與恩格思的學說是完成達爾文主義的之所未竟。這學說的出發點正是本着人與動物根本不同的觀點解釋給我們，怎麼人會成爲“有思想的動物”的，怎麼他會從自然的奴隸地位中跳出來，而成了主人的？使用“人造工

具”爲人類所具之特點，因之人類社會，一以工具之發展，其所創造之文化如何爲賴。即是說人是一種動物，在“人造自然”（文化）中，受了技術及勞動過程的影響，而發達了自身智慧的本能。換言之，人類社會之發展乃爲勞動發展的產物。

因此，唯物史觀發揚了並續成了達爾文主義，對我們說：當人用自己的勞動來宰制身外的自然界時，也把自身的自然界（譯者——即人的本質）也改變了。這就是說，人之所以是文化的動物，其發展不是因其有智慧的緣故，——恰巧相反，智慧是由於技術造成的，是受勞動過程的影響而發展的。或者換句話來說：並不是人類用自己的智慧去造成“勞動”和“鬥爭”的工具，正是相反，而是工具造成了人的智慧。再換一句話來說：“天賦的智慧本能”——人的智力是人類的雙手，人的勞動之結晶品。

這樣，手就是人的本身和其智慧的真實“創

造者”！勞動實爲人類智慧的根源，即所謂“上帝的火花”——智力的真正原因。這裏可以看得出來，勞動與智慧的相互關係，勞動是母，智慧是子。著名的政治經濟學者搬替(Pitty)(譯者——搬替英人)說過：“自然是物質財富之母，勞動是其父”。這裏把他的話稍稍改良一下，可以說：要是假定自然爲人類之母，則人類的父當推勞動了。〔註——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的第一卷第一章有這樣的一句話〕

所謂“智慧由天所賦”及“意識是滋長於自然”等等說法，全無稽謬論；人的意識以及人的本身(譯者——即本質)，是有其歷史的，要想了解這種歷史，必須要明白人類怎麼去宰制身外的自然界。總之，我們可以十分堅決地把舊時的公式所謂“先有思想”(或者照聖經上的話“先有語言”)的話倒裝過來說，“先有勞動”。

從達爾文主義轉到馬克思主義

照達爾文的見解，生物發展的動力，是自然淘汰。在這點上，動物界的歷史，可說就是一部自然工藝學發展史，即是某種動物，在求適應其所生活中之自然界的情形的過程中一部自然的和生理的器官發展史。但因為動物界在其機官上所得到的變化，並非由於自己的意志和努力，而却是冗長悠遠，千百萬年間以內，將沒有相當器官以適應環境的生物，一個個的消滅死亡，將有這些器官的生物，繁殖滋茂的結果，所以這種自然的生理的器官整個變化的過程，是被動的，消極的現象。

至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如何，那這兒最主要的動力是生產力。人類形式的歷史，澈底說來，就是一部人為工藝學發展史，即是在人類將自然服從和適應於自己的過程中一部人為的，技術的器

官和工具發展史。在此，因為人類用其自覺所創造而改善的工具以完成創造文化，改變自然環境的偉大事業，至不可思議的程度，所以在這個整個的過程中所看到的，是自動的生氣勃勃的氣象。

因此，不論動物界也好，人類社會也好，其發展主要的動機，都是爲生存而鬥爭，不過兩者之間，其鬥爭性質不同，而表現形式各異：在動物界裏鬥爭是被動的現象，而其實現，乃由於天賦的器官；在人類社會裏，鬥爭却是自動的現象，其實現乃藉人爲的器官和勞動工具。換句話說：生產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作用，正與自然淘汰推動生物發展的作用一樣。

因此馬克思說：“人類歷史之所以異於自然歷史者非他，即前者爲我們所造，而後者非爲我們所造而已。工藝學開闢了人類對於自然界的主動關係（即人類自動的影響自然界的意願），啓發了人們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及生活中之社會

關係和由社會關係所發生出來的一切精神上的想象”——資本論第一卷第四部第十三章——註一。

雖然不能將達爾文主義的定律，機械式搬到社會現象的方面及研究社會過程裏來，但達爾文的學說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邏輯的連鎖，却並不因此而不存在，這是不難知道的。二者對於有機物加於自然界以一種有目的有效果的影響的了解，對於在生物學上的名詞所謂“自動的適應”而在社會學上所謂“生產”的了解，這就是這種邏輯連鎖的真髓所在。——註二。

“適應”就是對於自然界適應的意思，動物界的適應，是一種被動的現象，只有人類因為有勞動工具之幫助，才達到“自動的適應”的程度。這種自動適應的現象，生物學謂為“自動的適應”，社會學即叫做“生產”，名詞雖然不一，實質却是相同的。據恩格思的意見，兩大學說的邏輯連繫，正在乎此，

——譯者附註。

恩格思說得很好：“馬克思主義包含達爾文主義，而達爾文主義，並不包括馬克思主義，若是馬克思主義出發走入達爾文主義，則必須將‘自動適應’刪除，反之若自達爾文主義走入馬克思主義，則必須將‘自動適應’做為主動力引來。因此‘自動適應’有如一座橋樑，開發了從這個理論過渡到別個理論的可能。

不錯，常聽到有許多人這樣說：自動適應不見得只是人類特別優勝之點，就是其他一切動物全有這樣的本能。可是從上面所說的，我們就不難了解，此處是將“活動”與“自動適應”混淆為一來等量齊觀了。我們知道：“活動”是一具有運動能力的有機物的本能。只要牠運動或完成此種或彼種動作如營養自活，捕獲食物，或進以攻擊，或退以自保，便都是活動的。動物完成一件動作或實行其機體的功能，總常有此種或彼種之自然界的變化，與之相伴而生。譬如當尋找食物的時

候，動物可踐踏蹂躪野草，碎斷樹枝等；當其排泄之時，可以使地皮肥沃。可是這些變化，只是動物活動的結果，與自動適應全不相同。**自動適應**是一種特別活動的形式，是對於外界有目的有效果而且多少有點計劃的一種行動和影響。所以如上所說，自動適應的概念，已能將那生產——即一種經濟活動的過程——的意義，包括殆盡。自動的適應，雖不僅人類，即其他許多動物，亦有這項本能。但據吾人所知者，人類的自動適應與動物的自動適應，有數量上和質量上的不同。人類的自動適應是一種有意識的過程，而其他動物的，則純為一種本能的過程。（譬如螞蟻營巢，蜘蛛結網，跳鼠鑽穴，都是一種純粹本能的行動）。追溯動物界發展的階梯，那末，在極原始人類的祖先，類人猿，已可看出有意識的自動適應的萌芽：記得高等猿類每當漆黑之夜，輒用樹葉以蓋體，就是很好的例子。進一步我們所看到的，人類之自動適應的特注，不在自然工具，

却在人爲的工具幫助之下，對於外圍的自然界與一種有力的行動和影響。不錯，就是在人類的先行者……高等猿猴，——他們也能將現成的物品，當做工具來使用，可是他們最粗笨的工具，都不能自行生產，不能自覺砍劈石頭，就是一例。因此我們就知道，在動物界裏的自動適應，帶有“從屬”和“有限”的意義，所謂自動適應，不過是有機物活動的一定形式而已，將這兩種概念（即前面所說的“活動”與“自動適應”）混淆起來，是完全不對的。因爲這種混淆，就是無異將自動的與被動的適應之間的區別，化爲烏有，即此對於人類在其他有機物中所佔的地位及存在於社會發展的過程之中的許多特質，皆將茫然不可解了。

人類製造工具和相互合作的技能及與合作相聯的分工（爲改善勞動工具的條件）和利用自然力以實現勞動工具的動作，——這些都是使人類自動的適應其生存的條件，而加重其對於牠們的

統治的最主要的元素。工具爲人類生存的條件，人們在勞動工具即生存工具幫助之下以行生產，因此又自己創造了生存的條件，生存的條件創造了，其所創造的生存條件之意義及作用增進了，人類對於自然界之統治的程度，也必隨之增加。因此，社會生產（即人類對於自然界一種自動適應的過程），就是保障社會人類統治他的生存條件之可能者——是使人類超出其他動物界的主要特點。總而言之，從他的文化的各方面看來，社會人類正是自動適應或社會生產的產物”。註三，見恩格思——唯物的社會學大綱。

勞動，爲有機物發展的元素

達爾文主義，以動物學內物種的概念來考察人類的起源，而唯物史觀則解明這種動物的歷史的命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開始的地方，正爲達爾文主義研究告終之處，達爾文完結于動物學，

馬克思乃發端於社會學，從上面所說的看去，這些都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了。

更有一個重要地方，亦不難指明：即馬克思主義一部分已涉及達爾文主義方面，因此乃喚起一般生物學家注意於至今尚未爲他們所指出來，或即指明出來而未與以正確估計的有機物發展的元素——勞動。

恩格思的豐功偉績，即在以人類進化之例，來解釋勞動爲有機物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

形成新種的變化的原因，是生物學上中心問題之一。達爾文雖未否認在物種變化之中，除了自然淘汰以外，還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可是在表面上看來，他對於自然淘汰，却給了過度的估計和越限的意義。結果，達爾文主義者（更正確的說，達爾文主義的正統派）常把自然淘汰看作爲一切物種變化的惟一而萬能的因素。恩格思關於這點說：“當達爾文說到自然淘汰的時候，却把引起各個個體變化的 reason 這一層忽略了，主

要的只講到許多同類個體的脫化蛻變，怎樣漸漸的形成爲某一種民族或某一種類的標式的方法。在於達爾文主要的不是在追求這些變化的原因——這些原因一部分至今尚不明瞭，一部分僅能明瞭其大體——而是在說明這些物種的合理形式，（即爲其生長發育的結果一種固定的和保存很長的時間性的一種合理形式）。在此點上，達爾文將自己所發現的（意即指自然淘汰的法則——譯者註），未免形容得過度了，把自然淘汰當作物種變化獨一無二的特殊槓桿，因爲遷就於物種共同形式的問題，遂將個體重複演變的原因這一層，輕蔑忽視了，這確是一個缺點，爲達爾文及多數在科學界大步向前負有盛名的學者們所共犯的毛病。但事實却又不可否認的，沒有任何人能像達爾文這樣熱心研究，關於有機物的變化如何發生的問題，給了人們很多研究的興趣。——見恩格思所著之“駁杜林”。

這些言論大概是恩格思在達爾文學說發表以

後二十年所寫的。我們看到這個偉大的社會學家及思想家，對於一般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的問題，是如何澈頭澈尾的分析了解，並不把達爾文的意旨，當作金科玉律，空空洞洞的頤揚一遍，這才真不愧是達爾文的熱烈而通達的信徒啊！他說：“事實雖給理論之發展以可靠支柱，但理論本身的發展，仍屬十分幼稚。他日研究愈進步，則於今日所謂達爾文主義正統派（各種的生物進化的理論亦在其內），必將大大與以修正更改，實因此而無疑”。——見同書。

恩格思關於我們的類猿祖先變化的問題，又是如何的呢？他怎樣研究人類的起源的？

他說得極為透澈盡致：我們的手，語言的及其他各種的器官，都是漸漸發展的，因於所必需做的工作，就將這些器官在勞動的過程中，日益改善起來。換言之，照恩格思的意見，在人類機體變化的過程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人類的器官，在此種或彼種勞動的過程中的勞作操練。只

有在勞動幫助之下，只有因為勞作操練的原故，我們的此種或彼種器官，才能日益適應於新的任務，及將由此所得到的優美精華之點，傳之後人，累代相承。因此，照恩格思所見，勞動才是有機物變化的原因。自然並不能說這是惟一的原因，但為極重要的原因，則毫無疑義。

因此，恩格思之所以對於早已明瞭的問題與以注意者，即以因為勞作操練之故，人類的機體始行發展，順熟而日趨改善，且由此人類乃得到可能以征服外圍環境對於其要求所加之障礙，而使自然界適應自己。關於其他動物的機體及其單個的器官，亦復說及。謂後者因將操練的結果，歷代遺傳，即由於與征服外圍障礙相關之長期繼續使用的原故，器官乃進化而向前。反之，因為在自然界沒有引起那些器官活動的條件，致長期不使用和操練的結果，則那些器官，必退化而日行萎縮。由此可見，在其器官的形式與機能之間，存有極必須的聯繫，而形式改變的原因，

實受了勞動即操練和外界條件的影響。誰要是不懂得這個道理，那末當判斷物種及與此相關的人類起源的問題時必致“差之毫釐，謬已千里”了。

不僅在恩格思甚至在達爾文以前，在一八〇九年，有個法國著名生物學者納馬克 (Lamark) 就已經說到生物的器官之練習與否，和環境對於機體改變的影響，這是值得我們現在指出來的。無疑的，納馬克是一個物種變化理論的開創者，只可惜他沒有得到很多的材料，來做這個理論的科學根據。達爾文曾一度認識納馬克的理論，並且沒有把她輕輕放過。譬如達爾文說：“機體一部分繼續使用與不繼續使用的遺傳的結果，正與自然汰淘同其方向，其作用實亦不小”。但是他總沒有盡量地採用他先師的意見來解釋機體變化的道理。

〔註三〕：達爾文的物種變化的理論，是偏重物競天擇，自然淘汰的。所以只看到機體變化一方面的道理，很少注意及器官

使用和練習所發生的變化。這裏他雖承認機官繼續使用與否，同自然淘汰一樣，對於機體的變化，也不無影響，但對這點，始終沒有發揮盡致，這是我們對達爾文深抱遺憾的地方。——譯者。

看起來，恩格思是將納馬克的意旨，開了一個復興的新局面，補充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正是他才告訴了我們，勞動與自然淘汰一樣，同為有機物進化過程中的因素。這種過程的完成大概是如此：在勞動即習練操作和環境影響之下，在機體上發生了新的特點，這些特點，在自然淘汰幫助之下，在機體上漸次鞏固起來。重言之，這種過程或比較更複雜一些，也是可能的，但這兩種原素——勞動與淘汰——實彼此相輔相成，毫無衝突之處，却又是不辨而知的事。

蒲列哈諾夫說過：馬克思主義就是應用於社會學上的達爾文主義。那我們也可以大胆這樣說：達爾文主義即是應用於生物學上的馬克思主

義。在這兒我們就知道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研究一個現象——工藝學的兩方面，達爾文主義找着了一個鑰匙去啟發有機物世界在自然工藝學歷史上的發展的理解，而馬克思主義也找着了一個鑰匙去開發人類社會在人為工藝學歷史上的發展的真象。因此，世之學者要想在研究生物方面做個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那末，在研究人類社會方面，就不能不做個馬克思主義者。反之，不能為達爾文主義的信徒，即不能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但是絕不能以為人類歷史只是整個生物學的一部分現象：達爾文主義的法則即是有機物被動的器官的適應的法則——自然工藝學——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法則即自動的技術的適應的法則——人為工藝學——是並不一樣的。而且，表面上馬克思主義較達爾文主義更為寬泛，補充達爾文主義，啟發了許多新觀念。總而言之，這兩大學說只是整個的科學的唯物論的兩部分，彼此間有其邏輯的聯繫及內部的相互照應。

要之：兩大學說彼此兼含并蓄，互相關明，其關係固極密切也。

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 過程中的作用

經濟學家說，勞動爲一切財富之源。實際上，一切財源悉由勞動和自然二者合流而成；自然給勞動以物質，勞動即將物質變爲財富。但勞動的意義尚不止此；牠是整個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充義至盡，就說“勞動創造人類”也未嘗不可。

在數十萬年前，大約是地質學家所謂第三紀

之末葉，在熱帶的大陸上（現已沉沒為印度洋海底），曾經生存過一種類人猿，其發展的程度，已大有可觀。關於這個人類祖先的消息，達爾文曾這樣告訴我們：牠們遍體生毛，下顎有鬚，兩耳尖聾，羣居樹上。

古代猿猴，為適應其生活條件起見，當其行走，攀緣登蹠之際，兩手的工作常比兩腳的工作多；因此，行走時，便漸漸地脫離手的幫助，而養成直立步行的習慣。這一步就是從猿猴過渡到人類的一個主要關鍵。

現今各種類人猿，大概都能立豎，用兩足行走；不過在不得已的時候才這樣行走，且這樣行走還感些困難，其自然的姿勢還是半直立的樣子，有時且需要手的援助。其中大多數還握著兩個拳頭，用指關節抵地，攏著兩個腿子，蹣跚而行，就同跛子扶杖走路一般。這樣的由四腳行走到兩脚步行的過渡形式，在猴類中實屢見不鮮。但至今各種猿猴全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兩足行

走。

我們的遍體生毛的始祖，牠們底直立步行，起初尚是習慣的，後來才變爲必需，這麼一來，手的動作便越更特別起來。手與腳的分工，即在猴類中已有最顯著的表現。如當攀緣登躡時，手的使用其性質比腳要來得不同；要撕破或攫取食物多是用手，（有些下等哺乳動物常用前爪）；有些猴子能用手構木爲巢，如巨猩猩類常在樹枝間結一頂蓬以避風雨；有些猴用手執取木棒以禦敵人，或持果實石塊向敵人拋擲；要是一旦陷爲俘虜，則用手演出許多模仿人類的動作來。然而人類經過數十萬年勞動的結果，其兩手的發達自然高於猴類萬倍，人類和猴類比較，筋骨的數目和構造彼此相同，獨於兩手發達程度大相逕庭；就是文化最低的野蠻人所做出的動作，沒有一個猴子的手能够表演出來；自古至今，也沒有一個猴子能用自己的手製出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在數十萬年的過程中，人類祖先漸使兩手應

付某些行動，其行動在初自至爲簡單。時至今日，即最野蠻的人類，甚至榛榛狉狉復返于野獸狀況的人類，其發展程度已經比那過渡時代的動物，也高得多了。當人類的手造成功第一次的石刀時其經過的年月，至爲悠久，人類有史時代和牠比較起來，不過一瞬息而已。總之：兩手脫離其他勞務，漸能獲得新的伶巧增進技能，更將其後天的技巧，傳之子孫，而繼長增高以至於無窮。這確是人類歷史一個主要關頭。

由此可見手不光是勞動的器官而且是勞動的產品，祇有在勞動底幫助之下，手才能適應新的機能，而將後天所得筋肉的關節的，而時間更久甚至於骨格的特別構造皆傳給子孫；祇有在勞動的帮助之下，才能使屢代鍛練的結果，應用於新的功能上；祇有經過勞動的過程，人類底手才能達到高度的發展而完成神工鬼斧的技術，人間才有拉飛耳（Raphael）的繪畫，托爾瓦耳僧（Torvaldecen）底塑像，巴東林（Pohanin）底

音樂。

然而手不是孤立的而是整個的有機體之一部分。有利於手的，也有利於全身，手之為用，實有一舉兩利之功。

依達爾文底相互關係的定律，生物體上各部分之間，表面上似無何等聯絡，但實際上一部分特殊形式必和別一部分的某種形式常有連帶關係，舉例如下：凡動物有無圓核的紅血球，而後頸骨藉兩關節和脊骨上端相聯絡者必有乳腺以哺嬰兒；凡雙蹄類的哺乳動物必有複胃以供反芻之用；又如貓類之純白毛而有天青色眼睛的，其耳必聾。一部分形式的改變引起別一部分的形式的改變，其間因果關係，至今尙屬啞謎。人類兩手的漸趨完善，和兩腳的漸適於步行，必然也按同樣的相互定律影響於別的器官。至於其影響的實質到底如何，學者尙難言之。

手的發展之對於其他器官之重大的影響，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的祖先是羣居的動物。由於兩手

和勞動的發展，人類加於自然的權威逐漸增長，人類的眼界也跟著越更擴張，他在自然的場合內，時常發現新的事物。同時，勞動的發展，又促成社會各份子間的聯繫；由於彼此互助的結果，人類更了然於彼此合作的好處。人類至此便感覺得彼此晤談之必要。這種要求果然造成了相當的器官。猿類底不發達的食道，漸漸地改造起來，由簡單的氣管漸變為複雜的喉管，而口腔也漸能發出一個以上的連續音。

要正確地解釋語言的發生及其和勞動的關係，最好拿動物來作一比較觀。有少許動物及其中之比較發達者彼此傳達消息而無需緻音語。在天然情況中，沒有一種動物能自己說話或能了解人類底語言。獨於家畜則不然。譬如犬馬，和人相處，竟能在相當範圍內了解人的語言；牠們還訓練出一些複雜感覺，如對主人的愛慕和感謝等。（這些感覺，在他們未被人類豢養以前，是不能有的）祇可惜牠們底發音器官構造特別，專

向一定的方向發展，因此牠們底說話本能竟不能不被剝奪。但是祇要發音器官的狀況較為順利，這種缺點畢竟可以免除幾分。鳥底喉頸和人的大不相同，然而禽獸中能說話的祇有鳥類；鸚鵡挾其怪難聽的惡聲又要算鳥類中之最善於說辭者。不要以為鸚鵡不懂人言。牠不但常常自言自語，發表一些字句，牠還能在相當範圍內學習并了解別人對牠說的話。譬如你首先教牠一些慢罵的辭句，再去惹牠發怒，牠馬上便會利用那些辭句罵得你體無完膚。

人類發展的主要原動力，第一是勞動，其次就是與勞動相伴而生的經音語。在這兩種動力的影響之下，猴類的腦漸變而為人類的腦；兩者的構造雖然相同，但容量和完善程度則大有差別。腦球的發達必然引起感官的發達，也定如發音器官的進步必然引起聽官的進步一樣。鷹的視覺比人更遠，但不如人類觀察的明析；狗的嗅覺較人為發達，但不能像人一般的判別各種氣味。觸覺

也是一樣，猴子底觸覺非常滯鈍，人類由於手的發達，和勞動的結果，觸覺也便發達起來。

腦筋發達，感覺銳敏，（意識增進，思想發展）又轉而影響於勞動及語言而促其向前進步。這個進化底過程，自有人類以來就沒有一天停止過；雖各民族各時代發達的程度和方向頗有差別（間或因地位和時會的退化而停止文化的進步）但就整個的人類歷史而言，其演化的過程沒有不是前進的。

更有和人類相伴而生的原素，這就是社會。牠一方面促進勞動和語言的發達，另一方面指示牠們一定的方向。由緣木的猴羣進而成爲人類社會，其間不知經過多少千萬年。然而人類社會畢竟出現了。

猴類團體和人類社會，其根本異點何在？
——在勞動。

猴類團體常在地理條件支配和敵羣勢力消長之下，去獲得採食的地方；食盡，則轉徙於別

處；如此繼續，常為著奪取新地盤而作不斷的鬥爭。牠們常在地下亂撒尿屎，無意地施了一些肥料，除此之外，牠們所取之於自然界的，從來不多於自然界所供給的。要是一旦採食地盤被敵人佔據，種類的蕃殖也便停止，動物的數量可以保持從前的水平線，那算是僥倖之至了。

在一切動物中都有浪費食料的現象：牠們常常踩躡植物的幼芽：一個母羊快要產子了，而豺狼抓住就要吃她，半點也不饒情；希臘的灌木森林，多麼漂亮，然而山羊一出，把些嫩葉幼枝吃個乾淨，弄得到處都是“牛山濯濯”。這種“掠奪經濟”在動物進化過程中實有莫大的作用。因為“掠奪經濟”使動物有適應新的食料之必要；新的食料又在動物血液內造成新的化合成分而促起全體組織的變化；同時那些固守舊態，老死不變的動物便日就滅亡了！“掠奪經濟”曾經幫助了人類祖先的進化這是毫無疑義的，當時猴類團體由於其適應的天才比別的動物特別高明些，因此所得

到的植物食料也更豐富些，在植物中可食的部分牠又格外享用得多些，於是牠底糧食的種類逐漸增加，而身體所攝取的物質也越更複雜。人類發生的化學條件就在這裏告成。

但是，在這時候並無所謂勞動。勞動的發生只從製造工具的時候起。最初的勞動工具是什麼呢？觀察有史以前各民族的遺迹，和現今野蠻民族的實況，可以斷定最古的勞動工具為打獵和捕魚的器具，而獵具同時又是武器。打獵捕魚便是從完全蔬食過渡到蔬食肉食并用的橋梁。這一步是人類進化的新關頭。肉類食品比植物食品好得多了：凡有機體內新陳代謝所需要的物質，都在肉類食品中預備好了，因此肉食的消化過程可以縮短，其消化時間比蔬食短少得多，肉食的動物從此可以省下多少時間，精力和物質去過別的生活。人類對於植物的關係愈疏遠，則對於動物的統治越嚴重。無論習於以植物為主要食物而以動物為佐輔食品，或者以動物為主要食品而以植物

爲輔佐食品，其增加人的體力及其與日俱長之獨立性，爲功殆相若也。

肉食的影響還不止此。肉食實供給腦袋以更多的營養料，而使人的頭腦日趨發達而完善。吃齋的善人們！請恕我！人類的發生沒有肉食是不會成功的！至於因需要肉食而起世間人吃人的現象（在十世紀時，柏林人的始祖越烈達伯人和菲里誠人常吃自己的親屬）。則處今之時，對於我們，這已無多大意義可言了。

肉食的要求引出兩個更有重大意義的結果：(1)火的使用；(2)動物的馴養。火的使用再縮短食物消化的過程，因爲有了火以後，食物到口即已成半消化的性質。動物的馴養使人類得到有規則的食品的來源而不須專靠打獵營生；且家畜又常供給人類以本身的產物，(如乳漿之類)其養料並不讓於肉類。由此看來，這兩種結果，實直接地促成人類的解放。要是沒有這兩個原素，人類至今還不知落到什麼地步哩！

人類不但學會了吃一切可吃的東西，同時還習慣於居住於任何地帶。動物界自動的散處全世界者只有人類。別種動物也有習居各地的可能，但不是藉自己的本領而實現，而是人類把牠帶出去的（家畜和寄生蟲是這樣）。當原始人類從自己底家鄉（溫熱帶地方）遷徙到寒涼地帶（那裏一年只分冬夏二季），新的要求便跟著造成了：人類需要居室衣服以禦寒避濕。從此新的勞動部門和新的事業形式開始登上人類舞台。人獸間的界限也越更深遠了。

手，腦筋，說話器官三者相互作用（不但作用在個人上而且作用在整個社會上），人類由於這種作用便能開始經營更複雜的事業而完成更高的目的，勞動過程的本身也日趨繁雜而精密。漁獵之外，繼以牧畜；牧畜之外，繼以耕種；耕種之外，更有紡織，冶金，製陶，航行等；商業，工業又為後起之秀。此外更有藝術，科學；部落進為民族，國家；而政治，法律遂油然而

生；同時那麻醉人類頭腦而荒謬絕倫的宗教也在人類社會上跳梁施逞起來。如此河出海伏，五花八門，彷彿全屬人類腦筋的產物，而兩手的創作反退居於下位。而且遠在原始時代（例如原始家族）人們的智慧似乎已能預定工作計畫，而驅使別人的手去執行牠。可見腦筋主宰人類社會的一幅影片，其排演於思想界已不自今日始了！

如此，把人間一切文明盛業盡都歸功於腦筋的發展與活動，人們所習見的，儼然是行動出自思想而不是出自需要（需要自然也反應到腦筋上去而喚起意識）。如此再經過些時，便發生了唯心論的宇宙觀。這種學派統治一切思想，尤以古代學派衰微以後為最盛；至今在思想界還保存相當勢力；即達爾文主義之科學的唯物論者，尚不了解人類起源是什麼一回事，因為他們受了唯心論的影響，根本不懂得勞動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

上面已經說過，動物也能用自己底行動改變

自然環境，雖然在程度上不如人類的顯著；而在相互的動作之下，環境的改變又影響到動物的自身。因為自然界內沒有一種東西是絕對的單獨完成的；一種現象必影響於其他種現象，反之亦然。

運動有其各方面，而動作亦彼此相關。誰要是忘記了這個事實，便是極簡單的東西也會看不清楚。希臘的山羊阻礙森林事業，我們已經知道了。在愛蓮娜島北部，初到該地的水手把他們帶來的羊和豬放出去，牠們便在那裏吃盡一切植物，不留半點根種。因此便預備下一片空地，使日後移植過來的新植物得以繁殖。

動物雖然不斷的影響環境，但這種影響的發生在牠們是絲毫沒有預料的。可是人類越遠於禽獸，他們影響外界環境的性質越是深謀遠慮，向着某種預定方針而進行的動作。動物把一塊地方的植物咬盡了，再也不能創出新的來；人類把某處植物肅清，爲的是開闢熟地以培植五穀，保證

日後能獲取更多的糧食。他把有益的植物和家畜帶出遠門，復由此處移住彼處，因此就是一時代或一地帶的動植物也能叫牠改頭換面。至於人為淘汰之下，動植物之受改變者更屬駭人聽聞。現今許多培養的食料植物其所從出之野種植物，已難於辨認；各種家貓家犬，係從何種野獸變化而來，更屬不易斷言。

所謂有計畫有思考的動作，動物也有發生的可能，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一切原形質，有機蛋白質，都能對於外來刺激起一種簡單的反應運動。這就可以說是有計畫的動作的萌芽。這種反應運動在沒有細胞的地方即已存在，至於神經細胞內更不待言了！

食草蟲類捕獲食物的方法雖是無意識的動作，但不能說是無計畫的動作。動物的有意識有計畫的行動係與其神經系統相關而生，而哺乳動物已達到高度的發展。狐狸善能利用地勢所逃脫獵人的追尋，且深知利用地面上各種條件以為標

誌，這種事實在英格蘭獵人中已屬司空見慣。日常和人相處的高等家畜，其所表現的狡猾態度竟不亞於小孩子。人類在母胎內形體發展的歷史，就是把人類底動物祖宗（從蠕蟲類起）數百萬年過程中發展的歷史再演一遍。精神方面亦然，一個小孩子心理發展的過程也就是重演他底動物祖宗（至少是最後一級的祖宗）的智力進化史。但是各種野獸的動作無論其怎樣有計畫，有考察，牠總不能使牠底意志在地球上造成一點痕迹。這一齣把戲畢竟要人類才演得成功。

總之，動物祇能利用自然環境；牠在自然中引起一點變動完全是由於牠底軀體在空間占一位置之故。人類則自動地改變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聽從自己的意志。這就是人類和其他動物最後的真正的分界；而促成這個分界的又是勞動。

但是我們切不可以人力戰勝自然而自矜，在每次勝利之後，自然是要報復我們的。誠然，在初次嘗試中人們所得勝利的結果都是人類算定了

的；可是後來便要得到意外的報應，常把已經到手的東西都掉在九霄雲外。米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這些地方的居民會把森林伐盡以開闢耕地，殊不知這一著竟使全國變爲不毛之地：因爲森林消滅之後，保存水分的中心也不存在了。定居阿爾甫斯山的意大利人把南麓松杉盡行斬伐，初不料因此而使牧畜事業的失所憑藉；更不曾想到樹林消失之後，終年所依賴的山谷水源也從此斬斷，而當大雨傾盆之際，又致洪水滔滔氾濫於平原。歐洲農民底種植馬鈴薯，然而繼那纍纍的塊根而起者又有一種黑心症。（一種植物的流行病）。因此，我們應記着，人類宰制自然，無論如何，決不能像戰勝者控制異族俘虜一樣；人類不能超自然而獨立的東西，他們底一毛一骨，都是自然的從屬品，離開自然，便沒有什麼生活。所謂人類統治自然者，祇是人類找著自然的規律而善運用之而已。

實際上，人類已經一天一天的更明了自然的

規律，而其自動努力的遲早的結果，也漸能在自然通常發展的路途中把牠實現出來。自從十九世紀自然科學昌明之後，人類更有可能預先看到自己努力的遙遠的結果。（或至少是致力於生產方面的結果），而因此更能設法統馭這些結果。人類越向著這方面前進，他便越感覺并了解人與自然的合一，而歐洲中世紀（尤其是基督教全盛時期）所高唱的什麼人類與自然對立囉，精神和物質的矛盾囉，靈肉衝突囉，所有這些荒謬無稽之論，從此更沒有立足之餘地了。

人類為要學會預先知道他們所致力於生產事業的未來的自然的結果，曾經花費了千百年的工夫；但要預知同樣動作所得的更遠的社會的結果，那就尤其困難了。我們已經說過馬鈴薯及其相伴而生的黑心症。我們只要想一想，整個國民生計完全依賴着馬鈴薯，且僅僅依賴着馬鈴薯；更回想到一八四七年愛爾蘭人民因馬鈴薯生病而遭的飢饉，這種黑心症的意義何等重大！愛

爾蘭此次災難的結果，死了百萬人民，二百萬人民漂流於海外。當阿刺伯人學會了製造酒精之際，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歐洲多少土人竟因酒精而喪了性命；當科峯布發現美洲之時，他何曾想到歐洲奴隸制度剷除之後再有販賣黑奴之事出現！當十七和十八世紀之交，人們發明了蒸汽機；當時人們以為只是發明新奇的生產工具，哪裏知道同時又創造了再好不過的社會革命的工具。蒸汽機“呱呱墮地”之後，牠就在社會上造出極少數的富翁和大多數的“窮光旦”，牠起初使富翁們獲得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後來則引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劇烈鬥爭。階級鬥爭的結局，一定要打倒資產階級，剷除一切階級的矛盾。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漸能看出生產行為將來如何了局，這一點是從長久深刻的經驗和歷史事實的比較觀察中得到的。因此我們就有可能以調劑和駕馭一切未來的結果。

然而僅認識這種行為，尚不足以實施這種調

劑，還得必須徹底改革現在的生產方法，根本改造當今一切社會制度。

一切過去的生產方法都是爲的獲取目前的直接的勞動效果。至於比較遙遠的結果，須反復積累而後能發覺者，人們是不會注意的。原始農村公社的土地所有權，一方面是適應於當時人們足跡不出里巷，眼光不外十里的發展程度，另一方面是由於當時耕地過剩的現象。土地過剩的現象一旦消滅，公社的土地所有權也就喪失了。以上所述的生產形式，其結果便把社會分成統治的和被統治的兩個對敵的階級。在這種階級社會內，生產不止是製造被壓迫階級最低限度的消費品的，因此統治階級的利潤慾也可以暫時地推動生產的發展，這在現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表現得最明白。統治生產或壟斷交易的各個資本家，他們所心營目注者只是自己活動的目前的直接的有益效果而已，就是製造出來和交易完了的物品的使用價值如何，也被他們拋在腦後。總之，出賣商品

所得的利潤就是資產階級唯一的興奮劑。

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古典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其研究者只是人類經濟行為底直接的有益的共同結果；自然的，這種科學只不過是一定的社會組織理論方面的表現而已。在這樣的社會內，各個資本家完全為獲取直接的利潤而從事生產和交易，人們所注意的，當然只是目前直接的結果。一個工廠主或一個商人出賣商品，賺得普通利潤便已心滿意足，至於後來商品和買主如何，這於他們沒有什麼意味。西班牙人初到古巴，把山麓森林放火燒盡，為的是獲取柴灰以為肥料，而培植“市利三倍”的咖啡樹；可是他們沒有提防熱帶的暴雨會把肥沃的柔鬆的黑泥洗得乾淨。就自然的關係講也好，就社會的關係講也好，現時的生產方法反正只能顧及目前直接的結果。只可駭者，就是人類致力於生產方面的未來結果有時也未可逆料，譬如市場上供給和需要常成反比例而互相衝突，而形成所謂工業上十週期的

現象；德意志大恐慌時期不過是悲劇的開場白罷了，以個人勞動爲基礎的私有財產，必然會使工人喪失其私產，而社會財富漸漸集中於少數寄生蟲之手，……。(原文中斷)

人類進化的過程

人類由化分而來，這不但個人的發展如此（即由單個化分為複雜的有機體），整個的人類進化的歷史也是一樣。經千萬年的嘗試而後兩手和兩腳發生分化，身子便直立起來，這是人類和猿分路的起點。更由此發生緩音語，擴張腦筋，而人猿之間遂形成不可逾越的“鴻溝”。手的功用的專門化就是工具發現的預兆，工具發現又是人類

生產事業之先聲。就狹義言之，動物也有工具，如螞蟻，蜜蜂，水獺之類就是明顯例子，但是牠們的工具祇是牠本身的一部分，動物也能生產，但牠們的生產，對於自然界的影響等於零。只有人類才能留些痕迹于自然界；他不但變更動植物的位置，而且根本改變動植物世界；他可以改造他底環境的形式和氣候。他的豐功偉業可和宇宙同垂于不朽。

人類如何達到這步田地呢？根本原因就在他底兩隻手。蒸汽機不是現今世界最有力的工具嗎？而窮其究竟，還是起源于兩手。和兩手平行發展的還有頭腦，因而產生意識——起初簡單獨的實際的有益的活動，繼則有些生活于順利環境的民族，漸能從這些有益的活動中了解自然的定律。領悟自然的定律便增加了影響自然的手段。要知道，若沒有頭腦的相伴發展，單靠一雙空手，是造不出蒸汽機的。

同時我們還要談一談歷史。講到歷史，動物

也是有的，即動物的起源及其逐漸發展到現今狀況的歷史是也。然而這部歷史是別人替牠造就的，牠自己雖然參加過工作，但始終沒有徵求牠們的同意。只是人類越遠動物，越能有意識的製造自己的歷史，而那不可逆料的事實，和不能制馭的力量在此歷史上的勢力，越更減少，而歷史上有目的活動的結果越有保證。然而，持此繩墨以度人類歷史（現今文明人的歷史也在內）則見所樹立的目的和所達到的結果，兩者之間，往往“牛頭不對馬嘴”；而所為不可逆料的事實和不能制馭的力量遠出于人類的思考計畫之上。而當組織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的人類活動尚屬盲目的時候，當滿足生活要求的社會生產還是聽天由命，任意瞎撞的時候，當人類預定目標十有九失的時候，這種歷史上矛盾的現象總是不能免除的。現在工業先進國內人類已能驅使自然力，而無限地增加生產；現今一個小孩子的生產比從前數百大漢子還要多。然而生產增加的結果又是

怎樣的呢？剩餘勞動增加了，民衆的生計破產了，每十年一次的大恐慌註定了，這就是生產增進的報應。達爾文曾謂自由競爭，和生存競爭，乃禽獸世界的常態，世之經濟學者相率贊頌，奉爲金科玉律，誰知這句話正罵在現今資產階級身上（尤其是他的同鄉英國人身上）。祇有理性的生產組織，只有生產和消費有計畫的進行，社會生產才能真正提高，人類才配稱做萬物之靈，社會生產發展，社會的組織才更有力量。從此人類歷史上將開一新紀元，而人類一切活動和一切自然智識將有如旭日東昇，照遍天下，已往之一切陳迹，直等於螢光爝火而已。

完

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梗概

列寧著 畫室譯 定價三角

本書是列寧的一冊偉大的著作，雖是一本小小冊子，但已將科學的社會主義簡明的敍述出來。全書分二章：第一章爲馬克斯傳略，第二章爲馬克斯主義。在第二章裏將唯物觀，辯證法，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實際政策等，一一加以扼要的說明。讀了這本書，可以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

上海泰東圖書局版

最
出
新
版

馬克斯主義的 基本問題

• 實價四角五分

蒲列哈諾夫著 成嵩譯

偉大的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已成爲世人所公認的不刊的真理了！我們要是一個現代的人，那麼就必得研究馬克思主義，了解馬克思主義。本書爲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哈諾夫底傑作，內容簡明撮要，能給初學者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底具體方法與門徑；就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已有研究的人們，也能使他對於以前研究的系統化，更能進一步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深切地研究唯物論。

上海泰東圖書局版

最出
新 股

唯物史觀

(又名歷史的唯物論)

實價大洋
二元一角

布哈林原著 陶伯譯

本書的著者布哈林氏 Boukharin 是誰都知道的一個世界馳名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兼哲學家。這部唯物史觀乃是布氏一生最重要的傑作。自此書出版後，凡世界上有文字的民族差不多都已有翻譯，其價值究竟如何，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本譯本又是由專究社會學和哲學的陶伯先生直接由俄文原本譯出來的。并附有兩篇極重要的附錄：一是布氏答覆各哲學的詰難及他關於哲學上的新意見，是一篇極有價值而極關重要的文字；一是拉也夫斯基關於本書的“提問”，長約五萬字，對於本書的內容都一一按章逐節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尤其便於學者的研究。凡欲進一步深究哲學的人，對於此書絕非日置案前不可。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蘇俄的婦女

澤息卡斯密司著 孫亮譯

『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蘇俄自革命以後，整個的社會已改換了個和從前絕對不同的面孔；蘇俄的婦女，當然也隨了革命變得和「前絕對的兩樣了。本書係美國王格爾德蘇俄研究叢書之一，原著者親自到蘇俄實地考察之結果而著此書，詳細的敘述了蘇俄革命後婦女解放情形；婦工在工廠裏每個都在眉飛色舞的慶祝着得到解放的自由而勤奮的做着工，農婦怎樣參加村會會議，一般的婦女怎樣參加共公活動，蘇俄政府怎樣從新規定了婦女在社會的地位。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到蘇俄社會的各方面，一般的社會組織，法律，制度等都有所敘述，而現在更是怎樣進行着新的社會的建設。

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泰東圖書局

一之

新

書

鐵蹄

王傑克
倫敦著
抗夫譯

定價一元四角

廢人

林柏修譯

定價八角

冬天的春笑

蔣光慈譯

定價五角

愛的映照

孟超著

定價五角五分

笑與死

顧仲起著

定價五角

勝利的微笑

陳竹著

定價六角五分

黃昏的湖畔

余眠雪著

實價三角五分

俘虜的生還

譚勉予著

定價七角五分

歸來

陳白塵著

定價五角五分

新書之二

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 錢杏邨著 (二) 定價六角半
現代文藝研究 ······ 若英著 定價八角

俄國文學概論 ······ 蔣光慈編 定價九角

廣西的民間文學 ······ 罷篤仁輯 定價九角

俄羅斯文學史 ······ 黃清內封介著

現代文學概論 ······ 張奉吾編

中國近古音樂文學史 ······ 徐嘉瑞著

音樂的文學 ······ 朱謙之著

案(小說) ······ 克農著

泰東圖書局

